

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简史

大冶钢厂工人理论组
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政治理论教研室
武汉大学历史系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春秋末期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封建社会持续不断的农民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或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猛烈地冲击了维护这种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反孔斗争是我国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内容。劳动人民从来是反孔批孔的主力军。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从各方面影响和推动了法家对儒家的批判和斗争。

毛主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当前，在四届人大的伟大号召下，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一个总结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热潮正在形成，为了和全国广大工农兵以及专业理论工作者一道学习和研究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儒法斗争的影响，加深对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把历史经验应用到实际斗争中来，我们编写了这部《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简史》，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第一讲 奴隶们揭反孔序幕，柳下跖剥盗丘画皮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孔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

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荡，奴隶们的纷纷起义，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进行的夺权斗争，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

奴隶制是一种极野蛮的剥削制度。“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 and 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27页）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西周社会的上层建筑，从分封制、世袭制、等级制到奴隶主阶级的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压在奴隶们身上的枷锁。奴隶们是奴隶主的私产，他们被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不仅强迫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而且随意侮辱、鞭打、买卖和残杀，以至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殉葬品。奴隶们在这种毫无生存权利的状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起来斗争。他们或者成批逃亡，或者举行武装暴动。到春秋末期，奴隶起义连绵不断，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公元前613年郑国发生了奴隶大暴动；公元前550年，陈国的奴隶为反对筑城而斗争，把奴隶主贵族庆虎、庆寅杀掉；公元前520年，周王室里的“百工”起来造反；公元前478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围攻卫庄公，接着又赶走了卫侯辄。特别是齐、鲁地区柳下跖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声势最大，影响最深。在奴隶起义的猛烈冲击下，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在这大动荡的年代里，新兴地主阶级适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凭借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力，向奴隶主贵族进行了夺权斗争。仅在春秋时代，先后灭亡的奴隶制诸侯国就有五十三个。

面临灭亡的各国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或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地位，进行垂死挣扎。奴隶制的卫道士孔丘，适应奴隶主阶级的需要，抛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大肆叫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妄想复辟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统治地位。他还创立了一整套反动思想体系，极力鼓吹反动的“天命观”，宣扬“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史观，以及所谓仁义、孝悌、忠恕等反动政治伦理观点，妄想用这套精神枷锁来束缚奴隶们的手脚，防止“犯上作乱”，阻挡历史的前进。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奴隶们在同奴隶主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及其反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卫国农民训斥孔丘搞“克己复礼”是不识时务，鲁国守门人骂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复辟狂，楚人警告孔丘：那些腐朽的当权者快要完蛋了，要他收起开倒车的那一套，荷蓀丈人骂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匡人对他进行了愤怒的围攻，郑人骂他“累累若丧家之狗”。而柳下跖痛斥孔丘，最集中地反映了奴隶们对这个复辟狂的深刻批判，为我国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第一个战斗篇章。

柳下跖姓展名雄，鲁国西北部柳下地区（今河南省濮阳县东部柳下屯）人。当时人们把光着脚板的奴隶叫做跖，所以就把展雄称作柳下跖。柳下跖是一位杰出的奴隶起义的领袖。他那反压迫反奴役的思想象喷泉一样自由奔放；求解放的意志象旋风一样不可阻挡，讲革命道理的口才象江河一样滔滔不绝。他在战斗之前，善于调查研究，周密思考；打起仗来，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给奴隶们分配胜利果实时，又能做到公平合理。由于他处处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所以深受奴隶们的拥护和爱戴。他当时率领的九千多起义奴隶，以泰山为根据地，出没于黄河中下游的辽阔地区。所到之处，大小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四处逃窜。

正当奴隶主贵族对于柳下跖这支英勇善战的起义军咬牙切齿但又束手无策的时候，孔老

二跳了出来，表示要用他那条颠倒是非的长舌，诱使柳下跖放下武器，瓦解奴隶起义军。他带着颜渊、子贡坐上马车，怀着一肚子阴谋诡计，到了起义军的驻地。柳下跖深知孔丘的为人，听说他上门来，不禁勃然大怒，传令守门战士拒之门外，不屑一见。孔丘厚着脸皮再三求见，柳下跖索性唤他进来，同他面对面地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柳下跖怀着满腔阶级义愤，把“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的孔丘，揭得膛目结舌，批得哑口无言。

第一，戳穿孔丘所谓“文武之道”的反动实质。

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平时就把周朝的奴隶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孔丘见到柳下跖时，又抬出“先王”的偶像来，兜售所谓“文武之道”，并以“为将军造大城教百里”、“尊将军为诸侯”等谎言作诱饵，妄想使柳下跖上钩。面对孔丘的谰言，柳下跖一开口就痛斥他“作言造语”、“迷惑天下”；揭露他推崇的所谓“文武之道”根本不是“善道”，而是凭借权力“以强凌弱”的吃人之道；在那些“先王”统治下的社会，绝不是什么人间乐园，而是使广大劳动者完全丧失自由的极不平等的社会。你孔丘企图用利禄引诱我去作这些“乱人之徒”的臣子，那是白日做梦。柳下跖进一步指出，这些奴隶主贵族的头子，虽拥有天下，但由于鱼肉百姓，贪得无厌，其结果是后世衰微，立足无地，必然灭亡。奴隶们决不允许所谓行“先王”之道的社会继续存在，而要开创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

第二，痛斥维护奴隶主特权的等级制度。

孔丘为要维护奴隶制，大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建议奴隶主贵族不仅要靠刑罚去进行统治，还必须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礼教去维系统治。他又经常宣扬什么“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要人们一言一行都不违反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见到柳下跖时，在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面前，不敢公然讲什么“齐之以礼”，“非礼忽动”，而是转弯抹角地在讲了一番阿谀奉承的甜言密语后，就诱骗柳下跖放弃甲兵，跟他一道去“共祭先祖”。所谓“共祭先祖”，实际上就是要柳下跖追念“先王”之“法”，遵守奴隶主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服服贴贴地去当奴隶主的牛马。柳下跖听后火冒三丈，指着他的鼻子冷笑说：你孔丘说的如果是鬼神之事，那我不懂，如果是人间之事，那我都很清楚。告诉你，我们要有做人的起码权利：眼要看颜色，耳要听声音，嘴要尝滋味，志气要得到满足。“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是奴隶们争取人身权利的造反宣言，是对吃人的奴隶制度的有力声讨。柳下跖的这番话有力地戳穿了孔丘玩弄“共祭先祖”的诡计，愤怒地控诉了奴隶主迫使奴隶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尝，有话不能说的残酷罪行，揭露了孔丘鼓吹的“礼”完全是为维护奴隶主的特权服务的。

第三，判批所谓忠、孝、仁、义的反动说教。

孔丘鼓吹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说教，如所谓孝悌、忠恕、义勇等等，为奴隶主贵族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了一套政治的和道德的规范。当孔丘见到柳下跖时，有意把传说中或历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某些帝王，和一些顽固地对抗历史潮流的人如伯夷、叔齐之流，作为他自己制造的仁义道德的化身，颂扬为“圣人才士之行”。柳下跖对他这套谬论嗤之以鼻，嘲弄孔丘宣扬的所谓忠孝仁义“只能为天下笑”，“皆不足贵也”。柳下跖在领导奴隶起义斗争的过程中，按照奴隶阶级的利益，提出了与孔老二截然相反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奴隶主不劳而获是最不道德的，而奴隶们把奴隶主霸占的不义之财夺回来，才是最道德的。在夺取这些财

产时，舍生忘死，冲锋在前，这是勇；队伍转移时，为保卫战友的安全而退却在后，这是义；善于分析形势，掌握战机，这是智；缴获财物，分配公平，这是仁（“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这是对仁义智勇的全新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4页）

第四，还孔丘以本来面目。

孔丘在见柳下跖之前，以为自己有一套“修文武之道”的理论和欺世盗名的伎俩，会马到成功。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在柳下跖面前，政治上被打得惨败，理论上输个精光，最后连自己的丑恶灵魂也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柳下跖撕破了他“好面誉人”，“亦好背而毁之”的“巧伪人”的阴阳脸谱；揭露了他“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的贪婪本性和深重罪恶，并用“盗莫大于子（你）”这个结论还孔丘以本来面目。柳下跖除了逐条驳斥他的谬论外，还列举他在鲁国被赶走，在卫国无立足之地，到了齐国没人理睬，在陈蔡受到围攻等一连串的狼狈遭迂，以证明他由于顽固地开历史倒车，弄到“不容身于天下”。最后，柳下跖深恶痛绝地向孔丘下了驱逐令：“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孔老二碰得头破血流，吓得脸色苍白，浑身打颤，连滚带爬地上了车子，活象一条挨了打的恶狗，跌跌撞撞地溜走了。柳下跖痛斥孔丘，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批孔斗争的巨大威力。不管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如何起劲地为孔丘唱赞歌，也抹不掉这个反动阶级的“圣人”被奴隶们公开审判的历史。

柳下跖为奴隶的解放事业战斗了一生，在年老临终时，他嘱咐战友要将铜锤放到棺材里。他说：如果在地下遇见那些大奴隶贵族头子，定将敲碎他们的脑袋。（“死而操金椎以葬”，“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矣！”）充分表明柳下跖对奴隶主贵族和他们的代言人孔老二的深恶痛绝，和千百万奴隶们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在急风暴雨式的奴隶起义的猛烈地冲击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已如江河日下，朝不保夕。新兴地主阶级利用了奴隶起义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以封建生产方式取代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且逐步地取代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先秦时期的法家人物，面对这种现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了废井田，开阡陌，反对世卿世禄，主耕战，废分封，立郡县，破礼教，去迷信，以及人定胜天等理论和主张。他们在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斗争中，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但是，他们终究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归根到底，只是为了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过时的旧的剥削制度。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孔老二及其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可能象奴隶们那样的坚决和深刻。例如，法家在批判“法先王”时，只是从“变”的观点出发，要求破奴隶主阶级之旧，立地主阶级之新；而奴隶们则深刻地揭露“先王之道”是吃人之道，要求废除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又如法家在批判孔丘时，只是指出孔丘的反动谬论是“亡国（即要颠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之言也”，而奴隶们则揭露孔老二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揭露孔丘是一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一个“矫言伪行”，侥幸于封侯富贵”的政治骗子。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们的伟大斗争，粉碎了奴隶主贵族“克己复礼”的迷梦，推动了社会

发展。时隔二千多年，叛徒林彪竟把被奴隶所痛斥的孔孟之道捡起来，叨念“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宣扬“上智下愚”的英雄史观，作为他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回顾以柳下跖为代表的奴隶们的反孔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林彪的反动思想体系的历史渊源及其反动路线的极右实质，有助于发扬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志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更充分地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

第二讲 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逆流

——秦末农民的反孔斗争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又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实行了重大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主席曾明确地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是从奴隶社会脱胎出来的，它不外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仍然是建立在残酷压迫、剥削广大农奴或农民基础上的。因此，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自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必然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秦王朝也不例外。不过，秦王朝刚刚从分裂走向统一，又采取了包括“使黔首自实田”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措施，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某些人身自由和经济利益，所以当时农民虽然身受封建剥削，也感到比在奴隶制度和割据状态下所过的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虽有过小规模农民起义，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未激化为大规模的外部对抗。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刚刚建立，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及其反动的知识分子还在进行疯狂反扑，妄图卷土重来，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为了巩固新生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秦始皇曾多次对复辟、倒退的奴隶主反动势力，实行地主阶级专政，但是很不彻底。奴隶制的残余还是严重存在。奴隶主贵族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这就构成了农民同地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当新兴的地主阶级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旧的奴隶主贵族时，客观上就会使套在农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有所减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对主要矛盾的激化过程。如果奴隶主复辟势力抬头，奴隶主不但要向新兴的地主阶级反攻倒算，而且农民获得的某些权利又会丧失以尽，重新沦为奴隶。因此，农民一旦起来造反，就必然在反对封建压迫的同时，狠狠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以及为它服务的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一死，隐藏在秦王朝中央政权的奴隶主复辟派的政治代表赵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逼死了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秦二世，篡夺了国家最高权力。政变

后，立即改变了秦始皇进步的法家路线，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大搞复辟倒退，妄图使农民重新沦为奴隶，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种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宣告了赵高、胡亥反动统治迅速灭亡，并揭开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序幕。

一、敢把王侯踩脚下，蔑视“天命”闹革命

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王朝统治下的广大贫苦农民，由于身受种种剥削和压迫，本来就蕴藏着造反的要求。赵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后，不仅对秦始皇在世时依靠的法家领导集团大肆屠杀，而且继续营造骊山墓、阿房宫，“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大举征集贫苦农民充当戍卒，甚至以隆礼厚葬秦始皇为借口，恢复了人殉制度，实质上使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重新沦为奴隶。赵高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行径，使“黔首振恐”，反动派则弹冠相庆。正是在赵高政权强迫广大农民服劳役、兵役的过程中，陈胜、吴广和他们家乡附近的贫苦农民九百多人，被强征到千里之外的渔阳（今河北蓟县）服兵役。当他们被监送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刘村集）时，遇到大雨，无法按期赶到目的地。按照当时秦王朝的法律规定，误期就要杀头。怎么办？是象孔老二说的那样“听天由命”呢？还是积极地展开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早就胸怀“鸿鹄志”，敢把王侯当粪土的陈胜，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急忙找吴广商量：

“如今逃亡是死，起来造反也不过是死，与其等着死，不如与反动统治者拚死战斗。”（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这个意见立即得到了吴广的赞同。他们两人一起动手，杀死了押送戍卒的军官，并立即发动了生死与共的九百多名阶级兄弟。陈胜气壮山河地说：“大丈夫不死则罢，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掌握国家统治权力的人，难道是天生的吗？”（“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农民阶级的第一个造反宣言。它象一声春雷，冲破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论”；象一把巨斧，劈开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桎梏；象一把铁锤，砸碎了孔老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许“犯上作乱”的禁令，表现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求翻身解放，反对奴隶主复辟的革命造反精神。九百多名阶级兄弟听了陈胜的战斗动员，顿时热血沸腾，仇恨填膺，造反的呼声震撼大地。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就在大泽乡爆发了。

二、“伐无道，诛暴秦”，埋葬赵高王朝

赵高、胡亥复辟集团篡夺了国家最高权力后，立即改变了秦始皇进步的法家路线，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反动儒家的复辟路线。这条路线和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纲领一脉相承，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扶植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上台。赵高一上台，便反攻倒算，千方百计地“诛灭大臣、宗室，更置所亲信”。拥有重兵并一贯忠于秦始皇的蒙恬、蒙毅相继被害，秦始皇的子女二十多人也先后惨遭杀戮，“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被迫自杀；李斯则遭到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赵高的一切倒行逆施，包括对广大贫苦农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掠夺，是在秦王朝的名义下，并通过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赵高又以秦

王朝的名义，动用原有的地主阶级国家机器去镇压。因此，农民起义军高举“伐无道，诛暴秦”的大旗，同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势力展开了激烈搏斗。斗争的实质，主要是迎头痛击赵高的反革命复辟路线及其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

赵高一伙把“克己复礼”、“兴灭继绝”复辟奴隶制，看作是“天下有道”，而把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反，认为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农民起义军就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明确地指出，赵高搞“克己复礼”，妄图使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绝对不是什么“天下有道”，恰恰相反，乃是最大的“无道”。起义军就是要高举“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旗帜，兴师讨伐，迎头痛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后，攻城池，杀郡守，劫县令，反孔学，用木棍、锄头在很短的时间内，击败了成千上万手握大刀长矛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不少县城，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地方政权，给赵高妄图在全国范围内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路线以致命的打击。起义军打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时，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六、七百辆战车，一千多名骑兵，几万步兵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了。

正是在“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号召下，广大劳动群众，包括以黥布为首领的骊山奴隶起义和吕臣领导的“苍头军”都英勇地投入了这场反压迫、反剥削、反复辟的伟大斗争，而且也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力量都吸引进来，壮大了农民起义的声势，最后导致了赵高把持的秦王朝的溃灭。

三、痛斥暗藏的尊孔复辟派，创建农民革命政权

当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农民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原来六国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残渣余孽、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怀着复辟奴隶制的狼子野心，也扯起“反秦”的旗号混进了农民起义军队伍。象张耳、陈余一伙魏国旧贵族，因被秦始皇悬赏缉拿，改名换姓逃匿陈县；又如口口声声叫嚷“秦非吾友”的孔老二八世孙孔鲋，就曾疯狂对抗秦始皇的“焚书令”，把儒家的经书和礼器私藏在夹壁里。这些人钻进革命队伍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他们既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死对头，又是农民革命的大敌。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同这些暗藏的复辟派及其宣扬的孔孟之道进行尖锐的斗争。特别是在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讨论大政方针和引军直捣赵高王朝的重大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极为激烈。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农民起义既然是一场革命，必然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当起义军占领了陈县，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张耳、陈余一伙却躲在阴沟里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当务之急不是称王，而是要“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以德服人”。就是要陈胜、吴广不要建立农民政权，而是引兵西征，派人去把已经灭亡的旧六国贵族的后裔重新扶植起来，恢复诸侯分封制。按照孔老二的反动说教，放弃武装斗争，以仁义道德去使旧贵族心悦诚服。一句话，他们要陈胜完全按照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倒退路线办事。陈胜、吴广断然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谬论，根据起义军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就在陈县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张楚”。这是秦末农民反压迫、反剥削、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胜利，也是农民反孔斗争的丰硕成果。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农民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后，紧接着，又在施政方针问题上，同孔孟之徒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据《孔丛子·答问二十一》篇记载：有一次陈胜、吴广召开会议，讨论施政方针，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孔鲋赤膊上阵，又跳了出来，说什么：

“从前周朝所以能取代殷商，是因为把‘兴灭国，继绝世’作为施政的头等大事，现在要是认真按照周朝的做法去办，六国旧贵族就会归附，天下就会安定。否则，你们的事业是不会长久的”。（“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抑长久之本。”）这分明是要用孔孟之道去改变农民政权的性质，想利用农民的力量去恢复旧贵族失去的“天堂”。陈胜一眼就看穿了孔鲋玩弄的“克己复礼”的阴谋，斩钉截铁地说：“六国国君的后代我不能封，过去的先王对我有什么用？我们是自己起义斗出来的，和周朝情况不相同，为什么要按周朝那一套去办呢？”（“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批得孔鲋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我们是自己起义斗出来的”。这不但表明了农民起义军对孔孟的所谓“先王之道”的极端蔑视，决不允许“兴灭继绝”和恢复奴隶制的分封制，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了农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又是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是反对封建统治的。

孔鲋受到批判后，仍然贼心不死。后来又在要不要挥军西进，直捣咸阳这个问题上，肆意夸大赵高、章邯等反动势力，散布悲观情绪，鼓吹消极防守。陈胜怒不可遏地指着说：“我领导的军队，用不着你来胡言乱语！”陈胜还指出：“儒者可与守成，难与进取，信哉！”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旧贵族和反动儒生的“法古循礼”，复辟倒退，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的反动本质。

陈胜、吴广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在当时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了赵高操纵的反动政权，直接扫荡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及其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刘邦才能重新统一中国，建立西汉王朝，继续秦始皇开创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使法家路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刘邦以后，又经过文、景、武这几代皇帝，多次同奴隶主复辟势力以及新的割据势力进行反复斗争，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才得到巩固。一句话，秦末农民的大起义，归根到底，促进了国家的重新统一，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

秦汉之际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不是一帆风顺的。要使新的社会制度巩固下来，就必须大力扫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要做到这一点，单靠自上而下的革新运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非有一个千百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社会大变动不可。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所以比秦王朝的寿命长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汉之际所发生的农民大起义，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清除了旧制度的根基，使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在失去政权之后又一次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从而为西汉王朝建立后的一百多年内继续进行反复辟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当然不是说，从刘邦到汉武这几代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就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懂得借用农民群众的力量。而是说明处在上升时期的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只有在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一条比较正确的路线，才能有所作为。群众革命斗争的规模越大，处在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在顺应历史潮流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水涨船高，比他的前一代在某些方面显得突出一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秦汉之际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已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而他们的搞倒退、搞复辟，又都要从孔孟那里寻找思想武器。两

千年前的赵高是这样，两千年后的林彪也是这样。赵高为了复辟奴隶制，实行了最大限度的“克己”，“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采用“韬晦”之计，混进我们党内苦心经营了四十多年。赵高阴谋发动了沙丘反革命政变；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赵高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反动政治路线；林彪狂叫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两个历史时代的两个复辟派的头子，都借助于孔老二的亡灵，唱着孔老二的调子，妄图开历史倒车，而结果都自取灭亡。不过，赵高的搞复辟，不是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所能认识到的，也不是新兴地主阶级依靠本阶级的力量去消灭的。赵高复辟集团是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猛烈冲击后，才导致最后覆灭的。至于林彪复辟阴谋的败露和他的可耻下场，则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亿万人民群众反修防修斗争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导，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才能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秦汉之际阶级斗争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一切违反历史前进要求，大搞分裂活动，妄图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的反动派，都决没有好下场。张耳、陈余之流，一个个最后都身败名裂，为历史所唾弃。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团结战斗，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成为不可抗拒的伟大历史潮流，林彪及其死党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一切阴谋诡计，只能是海底捞月一场空，落得个机碎身死的可耻下场。

第三讲 横扫“天命”闹革命，打倒“苍天”立“黄天”

——西汉后期至隋唐农民的反孔斗争

西汉元帝（公元前四八至前三三年）至唐末（公元十世纪初）的近一千年，是我国封建制生产方式得到巩固和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已经过去，封建生产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阶级转变成为一种保守和反动的社会势力。特别是这个阶级中享有种种特权的上层部分即豪族大地主，乃是这种反动势力的最集中的代表。在政治上，他们长期垄断政权，顽固推行一条反对前进、反对变革的反动路线；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地掠夺和兼并土地，鱼肉人民。为了强化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和奴役，甚至采用某些残存的奴隶制剥削形式，实行以强烈的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荫户制”，把千百万破产农民变成他们的依附农民和奴婢，建立起封建宗法式和割据性的大土地庄园制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拣起曾经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孔孟之道，略加改造，炮制成为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宗教神学化的儒学体系，用以论证封建制度的神圣性和永恒性，作为统治和愚弄人民的思想武器。

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特别是豪族大地主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砸碎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在本时期内，曾多次地爆发过农民的起义和战争。著名的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

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翟让、窦建德等领导的起义和唐末黄巢起义。这些起义的主要锋芒，都集中地指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土地庄园制和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指向豪族地主势力和它把持的反动政权，从而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豪族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并使之最后归于消灭。与此同时，作为维护其腐朽统治的精神支柱，即宗教神学化的孔孟之道，在农民革命风暴的猛烈扫荡之下，不论怎样乔装打扮和变换骗术，也逃避不了日趋衰败的历史命运。

这一时期农民的反孔斗争，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的反孔斗争

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汉承秦制”，西汉王朝的前几代统治者继续奉行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同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生产力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到汉武帝（公元前一四〇至前八七年）时，他凭藉已经积蓄起来的经济、军事力量，提拔了奴隶出身的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经过三十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百年来严重存在的匈奴奴隶主的侵扰，赢得抗匈战争的的决定性胜利。但是，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建筑在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基础上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西汉王朝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加重，这一矛盾也就日益尖锐起来。面对着农民阶级越来越剧烈的反抗，西汉王朝便逐渐把专政职能全部转向对付农民。汉武帝在执行法家路线的同时，却没有拒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正是地主阶级由进步转向保守、反动的一种征兆。从汉元帝时起，西汉统治者就完全抛弃了法家路线，“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追封孔丘为“褒成宣尼公”，鼓吹什么“汉历久长，孔为赤制”，把董仲舒提出的“天道观”（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等一整套神学化的儒家学说，作为麻醉劳动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在儒家路线统治下的元、成、哀、平四代，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地主阶级特别是豪族大地主对农民的压榨更加残酷，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得”的绝境，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整个社会就像一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把持着实权的豪族地主集团，企图玩弄“换马术”来挽救自己即将被推翻的命运。公元八年，豪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之一王莽乘机取代了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

王莽是个典型的儒家复古派。他一登上“新”朝皇帝的宝座，就大搞倒行逆施，甚至复活奴隶制时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形式，给劳动人民增添了新的灾难，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这就如同往火药桶里投进了火种，酝酿已久的农民起义便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公元十七年，王匡、王凤在新市（今湖北京山县）率领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根据地，称“绿林军”。第二年，樊崇在山东莒县聚众起义，起义者用赤色涂眉，称“赤眉军”。与此同时，北方的铜马等数十部起义军也奋起响应。这一支支农民革命武装，犹如一把把钢刀，直插新莽王朝的心脏。公元二三年的昆阳（今河南叶县）之役，起义军浴血奋战，以少

胜多，打败了王莽的四十多万主力军，接着叩关直逼长安，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

西汉末年以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是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转化，即由进步转向反动、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以后发生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以王莽为代表的反动的豪族地主集团，而且猛烈地冲击了这个集团所推行的儒家路线和孔孟之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君权神授”，反“则天稽古”。

王莽上台不久，他的喽罗刘歆就恭维他能“则天稽古”。这正好道破了王莽儒家路线的反动实质。所谓“则天”，就是遵循“天命”。孔老二的“天命论”由董仲舒发展成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君权神授”论，变得更能适应反动地主阶级的需要。王莽代汉就是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号，胡诌什么“老天爷命令我王莽当皇帝，我不敢违抗天命，只得来当”。所谓“稽古”，就是“克己复礼”、“法先王”。王莽刚上台，就网罗大批儒生到京城长安制礼作乐，尊孔祭“圣”，还宣称以《周礼》等儒家经典作为施政的指导方针，下令施行禁止民田买卖的“王田制”，推行以掠夺广大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为目的所谓“五均”、“六管”和币制“改革”，并按照《周礼》的制度规章来改变官制名号，封王封侯。王莽一系列的“稽古”倒退行径，无一不是假托“天命”；因此谁反对他，就是违抗“天命”，就要以各种罪名处以刑罚。当时仅被罚为官奴的就有十多万。但是劳动人民从来不信什么“天命”，也不怕反动派的任何威吓。绿林、赤眉等起义军敢于起来反抗王莽这个自称“受命于天”的“天子”和他的倒行逆施，这是对儒家鼓吹的“君权神授”、“则天稽古”一类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当时有位名叫田戎的义军将领，号“扫地大将军”，表明起义农民决心挥起革命的铁扫帚，把大大小小的吸血鬼、寄生虫象垃圾一样扫除干净。在农民革命的扫荡下，王莽这个所谓“真命天子”被吓得心惊胆颤，丑态毕露。当起义军步步逼近长安时，他自知末日将临，竟按照儒家经典所说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的所谓“哭典”，带着一帮亲信喽罗到长安南郊，扮演“告天求救”的丑剧。他声泪俱下，自欺欺人地祷告：“天老爷既然把天下交给我王莽，如今就该奋发天威，消灭这群‘反贼’”。王莽哭南郊的丑剧收场不久，起义军就攻入长安，杀进皇宫。王莽狼狈逃往四面环水的“渐台”，嘴里哼着孔丘的老调：“天生德于予，汉兵（指起义军）其如予何？”指望保住一条狗命，但终究没有逃脱身首异处的可耻下场。王莽的头被送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县城）示众，又被愤怒的群众割掉他那条“如簧巧舌”，这正是对王莽一类骗子的无情嘲弄。农民军的辉煌胜利和新莽王朝的彻底完蛋这一铁的事实，给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君权神授”论以沉重的一击。

第二，批“上智下愚”，做历史“巨人”。

孔老二鼓吹“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把劳动人民看成是“难养”的“小人”、“野人”；董仲舒则诬蔑劳动人民是所谓“斗筭之性”的“下等人”，只配做奴隶、当牛马。农民军以实际行动批判了这种无耻的诽谤。公元二四年，绿林军先后在洛阳和长安成立革命政权，虽然拥立一个徒有虚名的刘玄为“更始皇帝”，但实权却操在王匡、王凤等农民军将领手中。昔日的“斗筭之民”、“老佣”和“人隶”，都成了掌握军政大权的“诸卿”，扬眉吐气，发号施令；而当年的达官贵人则累累如丧家之犬，不得不俯首听命。“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恩格斯：《论权威》）它把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了。在赤眉军内部，起义者互相以“巨人”相称，对领导者只称“三老”、“从事”、“卒史”，完全摒弃了森严

的等级观念。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是对王莽之流妄图复活反动的分封等级制的有力回击。特别是“巨人”这一称呼，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内容，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决心砸烂旧世界、翻身做主人的豪情壮志，也是对孔孟之徒诬蔑劳动人民为“小人”的尖锐批判。劳动人民是真正的历史“巨人”，而一切反动派却是一小撮不齿于人类的侏儒。

第三，蔑视“经学”大师，横扫孔孟之徒。

王莽为了替他的“稽古”倒退路线找根据、造舆论，曾经搜罗了成百名精研儒术的所谓经学“大师”麇集长安，还扩充太学，广招儒生，培养宣传孔孟之道的吹鼓手。农民革命的狂飙，把这帮尊孔派扫荡得七零八落。起义军攻占洛阳时，生俘儒学“太师”王匡，处决了为王莽大造“符命”谶纬的反动儒生哀章。在攻占长安时，什么《论语》大师包咸、《尚书》大师桓荣以及一大批“教授”、儒生，不是被起义军捉拿示众，就是抱着残经破卷逃入山林，改姓埋名，躲藏起来。那些混入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如李淑之流，鼓吹什么“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即改变用人制度，起用那些熟悉儒术的所谓“英俊之士”），妄图排斥农民军将领，改变农民政权的革命路线，则被投进监牢。由于农民军对儒家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扫荡，使“礼乐分崩，典文残落”。这是对西汉后期风靡一时的尊孔崇儒反动思潮的一次沉重打击。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还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反封建反儒教的妇女领袖，她们冲破了“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杀上了历史舞台。如山东海曲县的吕母率领流民起义，破县城，杀县官，两、三年内，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成为赤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原女子迟昭平也曾率领数千人起义，响应绿林军。她们的斗争锋芒直指反动的王莽王朝，表现了我国劳动妇女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强烈的反封建反孔精神。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刘秀窃夺去了，但是绿林、赤眉起义军横扫复古倒退逆流的英勇事迹，永远为劳动人民所传颂。西汉后期特别是新莽王朝的历史事实说明：封建统治者越是尊孔崇儒，倒行逆施，人民的反抗斗争就越剧烈，封建王朝的垮台也就越快。对此，代表地主阶级较低层的某些主张革新、进步的思想家如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是有所体验的。王充在批判尊孔派关于社会问题的谬论时，曾尖锐地指出：农民起来造反决不是什么不懂“礼义”的缘故，而是“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的必然结果。王充正是由于正视了现实，才看到了孔孟之道的虚妄，因而以“疾虚妄”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问孔》、《刺孟》等篇章，公然向反动的儒家经典挑战。这说明农民的起义和反孔斗争，总是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和影响着重儒法斗争的。

二、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反孔斗争

公元二五年，刘秀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重建汉王朝的统治，迁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是个不象样的法家。他一方面实行“严切”政治，重申“阿附蕃王法”，对阿谀奉承和托庇于王侯的人给予极严厉的处罚，目的在于防止诸侯王蓄养羽翼，尾大不掉，以抑制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又标榜以“柔道”治天下，对豪强大族让步，使豪强势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继续扩张。他还“宣布图谶于天下”，鼓励谶纬神学的泛滥。刘秀以后的东汉统治者，都是儒学的狂热信徒。汉明帝亲自在“明堂”讲经；汉章帝主持召

开白虎观会议，通过注释儒家经传，进一步把儒学与谶纬迷信揉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官方的尊孔法典——《白虎通义》，颁行全国，把孔丘神圣化、宗教化，使儒学正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在儒家路线的统治下，东汉社会愈演愈黑暗。豪族大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和掠夺土地，拥有亿万财产，建立起“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大庄园。他们“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等）于守令”，过着骄奢淫逸的腐烂生活。而广大破产农民则被迫重新沦为豪族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奴婢，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地主庄园的土地上。他们平日为地主无偿地劳动，战时则被逼为地主去送死，过着农奴式的悲惨生活。“生有终生之勤，死有暴骨之忧”，正是当时依附农民痛苦情景的真实写照。到了东汉末年，封建统治更加黑暗。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汉灵帝腐朽透顶，连他豢养的狗也是头戴官帽，身缠彩色丝带。他在朝廷里设“卖官所”，公开标价出卖官职。那些花钱买官做的污吏，“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狼”，加倍地搜刮民脂民膏，使劳动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斗争，才是出路。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成熟的。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恩格斯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流行的太平道这一“宗教的外衣”，作为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具。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他以传布太平道和给人治病为掩护，在广大农村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起义准备工作，终于将当时全国十三州中的八个州，即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数十万贫苦农民串联和组织起来，并成功地发动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大起义。起义农民头裹黄巾，手持长矛大刀，汇成巨大的革命洪流，从东南北三面同时向京都洛阳推进。八州上空战旗漫卷，大河两岸杀声震天。黄巾军刀锋纵横，东汉军队望风披靡。起义军每到一处，烧官府，杀官吏，围攻地主庄园，剥夺不义之财，夺回被强占去的部分土地，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队伍很快扩展到近二百万人。东汉政权在农民革命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迅速土崩瓦解。

黄巾起义也是一次伟大的讨孔运动，它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孟之道，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一，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天道观”，用农民的“黄天”取代地主阶级的“苍天”。

自从董仲舒根据孔丘的“天命论”提出了反动的“天道观”，就一直被两汉的封建统治者当作维护其世袭统治的理论依据。按照这一谬论，封建社会的一整套纲常伦理、典章制度，即所谓“道”，都是受自老天爷的，它象永世不易的苍天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改朝换代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虽然有过，但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和“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一句话：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农民要造反、要革命，首先必须打倒这种反动的“天道观”，取得思想上的解放。黄巾军继承和发展了秦末农民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光辉思想，豪迈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这个旗帜鲜明、充满胜利信心的革命口号，在政治上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推翻腐朽、垂死的东汉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苍天”），建立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黄天”）；在思想上，则是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天道观”的尖锐批判，指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地位不但是可变

的，而且应当完全颠倒过来！表明广大农民反孔斗争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都在逐步深化。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百万起义农民的战斗吼声，象闪电划破黑夜，似霹雳震碎长空，冲破孔孟之道的思想牢笼，激励着千百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投入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政权的伟大斗争。

第二，反对人剥削人的不平制度，提出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理想。

孟轲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把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压榨说成“天经地义”。董仲舒又加以发挥，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与天同意者也”。意思是说不劳而食的寄生虫是“上天”安排的，是绝对合理的。黄巾军对这种吃人的反动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大自然所生成化育的（“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筋骨体力，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里得到衣食的满足（“人人自有筋力，各自衣食其力”、“令人不穷”），剥削阶级有什么理由要霸占社会财富、吸吮劳动人民的膏血？！为了与儒家的吃人之道针锋相对，起义军领袖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分别号称“天公”、“人公”、“地公”将军，并且痛斥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是“其罪不除”的寄生虫！当时战斗在江浙的于吉，也提出了“凡事悉治，无复不平”的革命理想，指出“太仓之粟”，本非独有，那些“食于人”的“君子”，就是“仓中之鼠”！起义农民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虽然还没有触及造成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即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剥削与被剥削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直接原因。这就有力地戳穿了孔孟以及董仲舒所宣扬的那一套吃人的“通义”。

第三，捣毁罪恶孔府，打击反动儒生。

黄巾起义在对孔孟之道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用革命暴力捣毁罪恶孔府，打击反动儒生，摧毁了封建王朝的许多尊孔设施。自从董仲舒抛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主张之后，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反动统治者就把孔丘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强迫人们对它顶礼膜拜。孔丘的老巢——曲阜孔府也随着尊孔逆流的泛滥，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圣地”。但是起义农民却全然不把它放在眼里。黄巾军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直捣罪恶的孔府，对它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手挥大刀阔斧，见到刻有儒家经典的石碑就砸，碰到搞祭“圣”的礼器就毁，扯下孔丘的“圣像”踩在脚底，最后付之一炬，把这个神圣不可冒犯的吃人殿堂化为灰烬。农民起义军这种对孔丘偶像的直接鞭挞，在反孔斗争史上还是第一次。黄巾军对反动儒生也是切齿痛恨和坚决打击的。为反动统治者所“推慕”的讲授儒经的“名教授”国渊，是一个“笃学好古”的家伙，曾被黄巾军吓得潜逃辽东地区，成了流亡地主。国渊的同伙、被地主贵族吹捧为“英伟大士”的邴吉，被吓得逃跑到辽东后，为保全性命又投奔孔老二的后代北海相孔融。就是这个被反动统治者美化为“神童”，后来因猖狂反对曹操法家路线，阴谋叛乱而被曹操杀了头的孔融，也是被黄巾军打得丢盔卸甲才从死里逃生的。

在东汉军队和地方豪强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黄巾军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是，英雄的起义农民是无所畏惧的，他们蔑视孔丘的所谓“三畏”以及“民慢则纠之以猛”的反动说教，高唱着“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战歌而浴血奋战。就是在主力被东汉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后，分散在各地余部仍然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英勇地战斗了二十年。黄巾军为当时社会的前进和变革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他们有力地打击和削弱了西汉后期以来

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豪强大地主势力，遏制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在思想上，尖锐地批判了孔孟之道，使守旧、倒退的儒家反动路线威风扫地，这在客观上为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等法家人物推行一条前进、变革和统一的政治路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如曹操效法秦皇、汉武，大力推行的有进步意义的“屯田制”，正是在黄巾起义所造成的“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条件下才有了实施的可能；他的打击豪族、抑制兼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和贬斥孔孟儒生等许多积极措施，也只是在黄巾起义所造成的豪强势力衰微和孔孟儒学沦落的情况下，才找到现实的基础。所以，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能取代儒家路线而占据统治地位，归根到底，是受伟大的黄巾起义所制约的。

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反孔斗争

腐朽的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崩塌了。继之而起的是魏、蜀、吴三国的鼎立。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集团代曹魏，灭蜀、吴，建立晋朝（西晋），全国再度统一。但不久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据中原，晋室于三一七年东迁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由此开始了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在南方，四二〇年刘裕灭东晋后，又经过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更迭；在北方，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曾先后建立起十六个小国；直到三九八年才由鲜卑族拓跋部逐步统一起来，建立北魏王朝，历北齐、北周。五八一年，杨坚取代北周政权，改国号“隋”；五八九年灭南方陈朝，南北又重新走上统一的道路。

隋文帝杨坚顺应全国趋向统一和安定的历史潮流，进一步发展了秦汉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他又几乎集中了南北朝时代封建帝王的全部统治术，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和剥削。每年由全国各地集中调往京师长安的绢帛粟麦财货“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国库“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官僚、地主也都是“仓库盈溢”。这巨大的财富，全是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六〇四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他倒行逆施，穷奢极欲。修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二百万人，“丁男不充（足），以妇人兼役”。由于工程艰巨，条件恶劣，十人中有四、五人被活活累死。六〇五年，隋炀帝沿运河出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带领后妃、诸王、百官和僧尼道士等一大群，乘船数千只，强征八万多壮丁为他们挽船拉纤。沿途数百里的居民还得“献食”。所过之处，如遭大劫。六一一年，为了发动侵略性战争，他又征发山东、河北等地大量工匠和民夫，赶造海船，输送粮秣。造船工被迫“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之）三、四”。运军粮因路途遥远艰险，许多民夫有去无还，大量死亡。所谓“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等等，就是隋末社会生产凋敝、人民痛苦的写照。

反动统治者越是凶残暴戾，就越需要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来掩饰。杨广也正是如此。他除了继续尊孔丘为“先师尼父”，又封孔丘后裔为“绍圣侯”；自称“尊师重道”，“博访儒术”，把“孝悌”视为“人伦之本”，“德行”作为“立身之基”。但是，这一切的谎言和伪装，都不能阻止劳动人民奋起推翻隋朝反动统治的坚强决心。就在杨广准备发动第一次侵略战争时，被“扫地为兵”的山东地区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公元六一一年，铁匠王薄率众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首举义旗，星星之火顿成燎

原之势，在山东、河北、河南、江淮等辽阔地区内，义军纷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到六一七年，各路起义军逐渐汇合成三大主力军，即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这三支强大队伍，威武雄壮，所向披靡，浩浩荡荡地杀向反动的隋王朝，横扫地方官府和门阀豪族腐朽势力，最后摧毁了隋朝的残暴统治。

隋末农民的大起义，同时也是对孔孟之道的大讨伐。由董仲舒改造和宣扬的一套孔教神学，经过两汉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巾起义的猛烈扫荡，已经逐渐失去欺骗作用。因此，魏晋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变换手法，用道家玄学和佛教来修饰和补充孔学。玄学用老庄思想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合乎“天道自然”，佛教用因果报应把现实的富贵贫贱说成是前生修定，大搞儒道、儒佛反动思想同盟。他们以为孔孟之道有了玄学的滋养和佛教的辅助，会变得更富于欺骗性，使劳动人民安于现状，安于贫困。但是，就在玄学化的孔学猖獗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各族劳动人民就发动过多次起义和斗争，不断地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而隋末农民大起义更是给它以致命的一击。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批判孔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决心主宰历史的命运。

孔孟儒学，一贯把帝王将相看成是历史的主宰，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只配受驱使、受奴役，妄图用这种愚民政策，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王薄与此针锋相对，在起义后自号“知世郎”，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刀枪耀日光；……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有何伤”。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歌，是起义的号召书，号召贫苦农民拿起长矛大刀，起来推翻腐朽的隋王朝；是战斗的动员令，动员起义农民无所畏惧、提刀向前，勇敢地回击反动官军的镇压；同时也是对孔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深刻批判，表明广大农民群众决不是反动统治者所污蔑的什么“群氓”，他们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已经预见到世道在变化，隋王朝必然灭亡，穷苦人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决不听任统治者的愚弄和摆布，宁可战斗牺牲，不为反动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送死。这战斗的诗篇，像嘹亮的号角，激励着广大农民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革命征途。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也冲破了反动的愚民政策的束缚，明确地指出，隋王朝的反动统治“易于摇动”，并且认为只要正确分析形势，就可以“大有功于天下”，这不仅有力地戳穿了隋王朝虚弱的本质，而且表明了劳动人民主宰历史的决心。

第二，继秦汉起义农民之后，对反动的“天命论”进行再批判。

隋末起义农民，不信什么“天命”，也不信什么“前生修定”、“因果报应”，他们发扬了黄巾起义灭“苍天”、立“黄天”的革命精神，奋起造隋王朝的反。王薄公开号召农民：“要抗兵（指兵役），要抗选（指隋炀帝在民间选女进宫），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器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他们蔑视貌似强大的敌人，英勇地进行战斗，“守住青石城，人人得太平，学会扔石片，强似射弓箭”，“手拿竹竿枪，天天打胜仗”，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起义队伍。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发布檄文，愤怒声讨隋朝统治者“暴虐临人”、“强兵黩武”，决心打倒“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隋炀帝。王须拔（河北义军首领之一）自称“漫天王”，表示要让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蔓延全国，把隋王朝淹没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对企图诱骗劳动人民“安贫乐贱”的“天命论”的尖锐批判，也是对那个所谓“真命天子”隋炀帝杨广的愤怒声讨。穷途末路的隋炀帝被起义军的燎原烽火吓得神经错乱，睡卧不宁，常常梦见起义军向他杀来。

醒时取镜照面，看看脑袋确实还长在颈项，又无可奈何地悲叹：“我这个好头颅，不知该谁来斩它”，最后还是落得个被缢死的下场。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说明，真正强大的不是什么“受命于天”的反动派，而是不信“天命”的革命人民。

第三，猛烈扫荡儒门士族，坚决毁弃儒家经典。

自从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门阀士族，是一股极端腐朽反动的社会势力。他们“礼学极精”，号称“儒门”，是魏晋以来历代统治者推行儒家路线的社会基础。隋末农民在捣毁孔府、严惩腐儒的同时，对所谓“儒门士族”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和致命的打击。据史书记载：农民军“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方领矩步之徒（指儒生），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经过起义扫荡之后，“学者沦丧，儒教陵迟（衰落）”，“关东魏齐著姓皆沦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即潼关以东的魏齐燕赵旧地的一些著名士族大姓都衰落了，失去世代做官的传统）。隋末农民这种对儒家经籍的坚决毁弃和对儒门士族、反动儒生的无情镇压，极大地动摇了魏晋以来玄学化了的孔孟儒学的社会根基。

隋末农民大起义，历时十三年，起义群众数百万，革命烈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这次起义特别沉重地打击了门阀豪族势力，使这个垄断政权近四个世纪的反动阶层从此衰落。唐初的一些大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隋末农民起义所打出的这个局面，正是唐代前期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以及法家路线得以推行的基本条件。

四、唐末黄巢起义的反孔斗争

公元六一七年，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利用隋军主力已被农民起义军大量歼灭的时机，起兵反隋，削平地方割据军阀，并先后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军，逐步确立李唐王朝在全国的统治。隋末农民起义对奉行儒家路线的门阀豪族势力的沉重打击，为唐太宗李世民推行法家路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同时，李世民鉴于隋王朝二世而亡的命运，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法家传统的耕战政策，严明法制，抑制豪强，反对分裂，进一步强化了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在抵御突厥贵族的侵扰、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促进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李世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唐王朝是建立在对革命农民的血腥镇压和疯狂的反攻倒算的基础上的，它从来没有对农民实行过什么“让步”政策，因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就在李世民统治的“贞观”年间，由于他在主要推行法家路线的同时，也搞了一些尊孔措施，扶植新的豪强势力，日益加重人民的徭役和兵役负担，人民群众被迫多次暴动和起义。唐中叶以后，社会阶级矛盾就进一步激化了。贵族官僚地主和僧侣地主，竞相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加上不断发生的藩镇割据势力的叛乱和混战，农民大量破产和逃亡，正是“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的居。”破产农民越来越多地沦为地主的佃户（“私属”），终年辛劳，不得休息。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农民过着“橡实甞饥肠”（用橡树子充饥）的痛苦生活，呈现出“累累作饿殍”（殍，音漂。到处是因饥饿致死的穷人）的悲惨情景。到唐朝末年，人民更加痛苦不堪，经当时人指出的就有如下八种：一苦“官吏苛刻”，二苦高利贷盘剥，三苦赋税繁多，四苦敲诈勒索，五苦替逃亡户摊税服役，六苦“冤不得理、屈不得伸”，七苦“冻

无衣、饥无食”，八苦“病不得医，死不得葬”。这当然还不是劳动人民所受痛苦的全部，但已经够悲惨的了。

唐朝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奴役。他们一面大力提倡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之类的鬼话，一面大搞尊孔读经，鼓吹孔孟之道。唐玄宗李隆基追谥孔丘为“文宣王”，注《孝经》颁发全国，还亲自到曲阜祭孔朝圣，叫嚷要用孔学来“美政教、移风俗”，企图以此来扭转隋末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儒学陵迟”的局面。韩愈以孔孟之道的所谓“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不遗余力地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原道》）把封建皇帝、大小官吏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能改变的。但是，无论唐朝统治者采取何种手法，暴力统治也好，精神奴役也好，都无法解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无法阻挡人民要反抗、要革命的历史潮流。

早在公元六五三年，就发生过陆洲（今浙江建德）妇女陈硕真领导的起义，并一度建立革命政权，称“文佳皇帝”。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皇帝，也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唯一女皇帝。陈硕真的革命行动，给了儒家所谓“君权神授”、“妇女中馈”、“国不可使（妇女）预政”等谬论的以沉重的打击。这次起义之后，又接连发生过多多次农民起义。

公元八七四年，一场震撼唐朝反动统治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王仙芝率众数千人首先在河南起义，号“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布檄文，痛斥唐王朝统治者“贪吝、赋重，尝罚不平”，斗争锋芒直指地主阶级反动政权和封建剥削制度，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第二年，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起义响应。两支队伍汇合后，声威大振，英勇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后来王仙芝在战斗中牺牲，黄巢被拥立为首领，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在黄巢统一领导下，起义军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南征北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行程数万里，起义群众数十万人，最后攻占了唐王朝的京城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唐僖宗狼狈逃亡四川。这种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过程，同时也必然是猛烈地冲击孔孟之道的过程。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敢革“天命”，直捣封建王朝。

黄巢起义提出“冲天”的革命口号，是长期以来劳动人民批判“天命论”的新发展。其特点是：坚决否定以“天”为象征的神权，根本否认有什么“神授”的“君权”。从孔孟到董仲舒、韩愈，都宣扬“天命”，鼓吹“君权神授”。韩愈说：“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

“天”有“尝善罚恶”的威灵，谁若违背“天意”，就要遭受“天刑”；因此“天”所授予的君权，“天”所规定的贵贱差别，是不能反对和改变的。黄巢的“冲天”口号，把这些反动谬论一扫无余，剥掉了蒙在封建等级制度上面那层骗人的神圣外衣，大大解放了广大群众的思想。它象响亮的号角，动员和激励千百万革命农民英勇地朝着反动的封建王朝进军。

黄巢的这种“冲天”思想，早已反映在他在起义前写的一首《咏菊》诗中。诗中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气壮山河的战斗诗篇，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发自内心的革命造反之声，也是高瞻远瞩的光辉预言。“我花”即菊花，象征着以黄巢为领袖的农民革命力量；“百花”是指以唐王朝为代表的“群魔”。全诗的寓意是说，一旦时机成熟，农民起来造反，就能够消灭“群魔”，占领长安，推翻唐朝封建统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农民军的伟大革命实践，使黄巢的这一预言变成

了现实。八八一年，黄巢率领的农民军以“冲天”的英雄气概直取长安，唐僖宗不知所措，在群臣的簇拥下仓惶逃命。农民军怀着胜利的喜悦，浩浩荡荡开进长安城。黄巢乘“金装肩舆”，战士们头扎红绸，衣甲鲜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何等威武雄壮！人民群众夹道欢迎，锣鼓鞭炮齐鸣，长安城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真个是“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了。历史又一次雄辩地说明所谓“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人民的革命才是改天换地的最大权威。

第二，实行“均平”，横扫地主豪强。

黄巢和王仙芝提出“平均”或“均平”的口号，并且和“冲天”的口号联系起来，这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反对贫富不均的革命要求和斗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孔孟、董仲舒和韩愈都一脉相承地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韩愈甚至杀气腾腾地叫嚣：

“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上，则诛！”儒家的这套反动思想和政治路线，劳动人民是深受其害、深有体验的，必须有“冲天”的反潮流精神和强大的革命暴力，才能批倒剥削、压迫“有理”的谬论，推翻封建统治，实现“均平”的革命理想。黄巢起义军在占领长安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国号“大齐”，就是表明要用革命政权来保证“均平”理想的实现。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黄巢起义军始终依靠革命的暴力作后盾，努力实行“均平”纲领。他们无情地镇压和打击贪官污吏、豪强地主，使“富家皆跳而驱”（有钱人光着脚板仓惶逃命），“犹复广侵田宅，滥读财货”（全部没收官僚、地主霸占的土地、房屋和财产）；把没收来的大量财物、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并对群众说：“黄巢起兵，是为了老百姓，不象李家（指唐王朝），你们一点也不用害怕”。唐末诗人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的诗句，正是起义农民打击官僚地主、世家豪族，实行“均平”革命要求的真实写照。

第三，痛击“复礼”，严惩反动儒生。

在农民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一些尊孔崇儒的反动分子，或者摇身一变，混进革命队伍，或者暂时隐蔽起来，待机而动，以实现其“克己复礼”即复辟唐王朝统治的反革命愿望。黄巢农民革命政权同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

当时，长安城里一小撮反动儒生暗地里书写反动诗词，有所谓“自从大驾（指唐僖宗）走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笏，音户，象征权力），食肉朱唇却吃齋（碎野菜）”和“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等黑话，发泄他们对“卑贱的”持犁黑手即劳动农民掌握国家政权的刻骨仇恨，和对“高贵的”食肉者即剥削阶级寄生虫被农民政权实行革命专政的深怀不满，幻想“依旧”残存的唐王朝能够卷土重来，阻挡“均平”的革命潮流，恢复他们失去的富贵“天堂”。这一小撮复辟小丑利令智昏，竟敢把这样的黑诗贴在农民革命机关的大门上，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对于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这一疯狂挑战，黄巢当即予以迎头痛击，下令“大索”城内反动儒生，“尽杀之”。

原唐朝大将张直方，玩弄阴险狡猾的“巧伪人”手法，窃据了农民政权的官职，暗中却把一百多个反动官吏窝藏在家里，伺机搞垮农民革命政权，复辟唐王朝的一统天下。起义军发觉后，黄巢亲自前往搜查，将张直方和他窝藏的反革命同伙一网打尽，全部处死。

列宁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论国家》）。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对那些疯狂从事反革命“复礼”活动的阶级敌人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同样，在夺取政权和实行“均平”的过程，坚决镇压那些敢于反抗的反动分子，也是十

分必要的。唐朝及其后的反动统治阶级胡说什么黄巢“纵兵屠杀”、“杀人八百万”完全是无耻污蔑。在镇压和压迫敌对阶级这个问题上，黄巢起义军不是做得过分了，而是做得不够彻底，因而让唐王朝获得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进行疯狂反扑，把农民革命政权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黄巢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勋是不朽的。它彻底扫荡了门阀豪族残余势力，猛烈地打击了经过董仲舒、韩愈具体发展了的孔孟儒学，严重地动摇了唐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起义军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均平”的革命口号，对以后的农民起义有很大影响。宋代农民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明代农民提出的“均田免粮”以及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等，都是这种“均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

从西汉后期至隋唐时期的多次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对我们有以下的启示：

首先是，反“天命论”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的重要性。孔丘的“天命论”经董仲舒改造成“天道观”，是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实行政治、经济统治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劳动人民要胜利地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就必须狠批反动的“天命论”或“天道观”，取得思想斗争的胜利。这种反“天命论”的思想斗争，实际上一直继续到今天。林彪狂热鼓吹的反动“天才论”，就是儒家“天命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为林彪及其死党树立反动权威，为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林家世袭王朝服务的。因此，批判林彪的反动“天才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研究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反“天命论”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把批林和批孔的斗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其次是，人民群众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没有这种思想解放，就不能造成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造成革命战争的燎原烈火。西汉末年的起义农民批判了儒家污蔑劳动群众为天生的“小人”的谬论，认识到自己就是改天换地的“巨人”，激发了反对王莽政权的战斗热情；隋末起义农民批判了儒家污蔑劳动群众是天生的“下愚”的谬论，满怀豪情地自命为“知世郎”，焕发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唐末黄巢起义在总结以往历次农民反孔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更坚决、更彻底地否定儒家的“天命论”，把“天命”和它在人间的化身封建王朝这两付枷锁统统砸烂，表现了“冲天”的英雄气概。当前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也是一次人民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伟大运动，它必将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迅猛地向前发展。

（全文未完，待续）